

战争史研究丛书

风中的旗帜

欧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战争史研究丛书

风中的旗帜

欧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的旗帜：欧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 阎京生，刘怡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113-0576-3

I. ①风… II. ①阎… ②刘… III. ①欧洲—近代史—史料 IV. K50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0508号

● 风中的旗帜：欧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 项竹薇

作 者 / 阎京生 刘怡

责任编辑 / 文 锋

特约编辑 / 张秀琴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30千字

印 刷 /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576-3

定 价 /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 64446051 传真：(010) 64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战争与人

——《战争史研究丛书》序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

“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不确定性—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一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创始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

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

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上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 于西坝河

目录CONTENTS

P1 巴尔干杂拌

P2 上帝的后花园 P5 “来自北方的解放者” P11 马其顿问题 P18

巴尔干战争 P24 从萨拉热窝到萨洛尼卡 P31 “火车头沙皇” P41

为德国火中取栗 P51 退潮 P57 新秩序 P63 附录：欧洲王室的出

口商——萨克森·科堡——哥达

P65 风中的森林

P66 卡莱伐拉的国土和人民 P67 瑞典王国的边疆省份 P75 拿

破仑战争 P79 俄国治下的大公国 P83 独立战争 P96 “吞剑外

交” P104冬战 P123续战 P139重生 P149附录：曼纳海姆

元帅的早年生涯

P153奥兰治旗高高飘扬

P154“我，荷兰国王，拿骚的威廉” P158飞翔的荷兰人 P167灭

亡与重生 P172百年和平 P179五日战争 P195多尔曼少将的奋

战 P206战斗的荷兰人 P212北约岁月 P214奥兰治·拿骚家族

的起源

P216主要参考书目

巴尔干杂拌

近世的保加利亚与战争





上帝的后花园

“巴尔干山耸云空，蓝色多瑙波涛涌，红日高照色雷斯，庇林浮现紫雾中。”

这是保加利亚国歌《亲爱的父母邦》的歌词开头，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这个巴尔干小国的地理面貌。在保加利亚的民间传说中，上帝在创造出太阳、月亮、星星之后，又创造了天地和人畜，并把土地分给了不同的人种和国度。迟到的保加利亚人问上帝：“我们的国家在哪里？”上帝环顾四周，说：“土地都分完了。既然如此，你们就住到我的后花园里去吧。”这样，保加利亚就有了“上帝的后花园”的美称。

一份颇有研究价值的史料——作于公元8世纪的《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记录了早期保加利亚的历代统治者、其家族成员和各可汗的在位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保加尔人已经同斯拉夫部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尔可汗是统治者。卡尔达姆可汗（777~803年在位）和克鲁姆可汗（803~814年在位）是其中最著名的统治者，他们向北进攻并消灭了阿瓦尔汗国，向南袭掠拜占廷帝国，向西北进攻法兰克帝国。克鲁姆可汗的武功尤其显著，他在战争中杀死了拜占廷皇帝尼基弗鲁斯，然后按照亚洲大草原的传统，将后者的头骨做成了酒杯。

有趣的是，《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里采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当时流行于东



1. 保加利亚人屠杀拜占廷人，公元6世纪壁画。

2. 西美昂一世。

欧的拜占廷纪年，而是古老的中国十二生肖纪年：鼠年、蛇年、马年、狗年……这种纪年法无疑从侧面有力地证明了保加利亚人的亚洲起源。

893~927年在位的西美昂可汗把保加利亚的领土扩张到了极点。他在战争中连连打败拜占廷军队，深入帝国腹地，甚至到达加里波利半岛和希腊南部的科林斯海峡，与拜占廷结盟的塞尔维亚帝国也于

924年亡于保加利亚大军的铁蹄之下。西美昂在对拜占廷作战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废弃了原来所用的“克尼亚兹”（古希腊语“君主”，今日俄语等语言中的“公爵”）称号，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之恺撒”，或称“沙皇”。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人已经完全被斯拉夫化，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保加利亚人。

西美昂的目的不在于创建一个新帝国，而是梦想通过自己的国家来充实和恢复一个包括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广阔帝国，也就是说重建东罗马帝国。然而他的伟业只延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他死后，保加利亚帝国的大部分土地被拜占廷收回，部分土地则落入与拜占廷皇帝联合行动的若干塞尔维亚王公之手。971年，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二世被拜占廷俘虏，到了君士坦丁堡。到1018年，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已经被拜占廷皇帝巴西尔二世灭亡。尽管如此，西美昂的帝国还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复兴西美昂帝国的梦想成了巴尔干斯拉夫人以后多次运动的纲领和宗旨。

12世纪，拜占廷帝国在塞尔柱突厥人、马扎尔人、威尼斯人和十字军等势力的夹攻下日趋衰弱。皇帝的权力极弱，有些封建领主开始独霸一方。在这种局势下，保加利亚贵族伊凡·阿森和彼得·阿森兄弟于1185年秋天发动了暴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拜占廷皇帝伊萨克·安吉洛斯被迫承认保加利亚的独立，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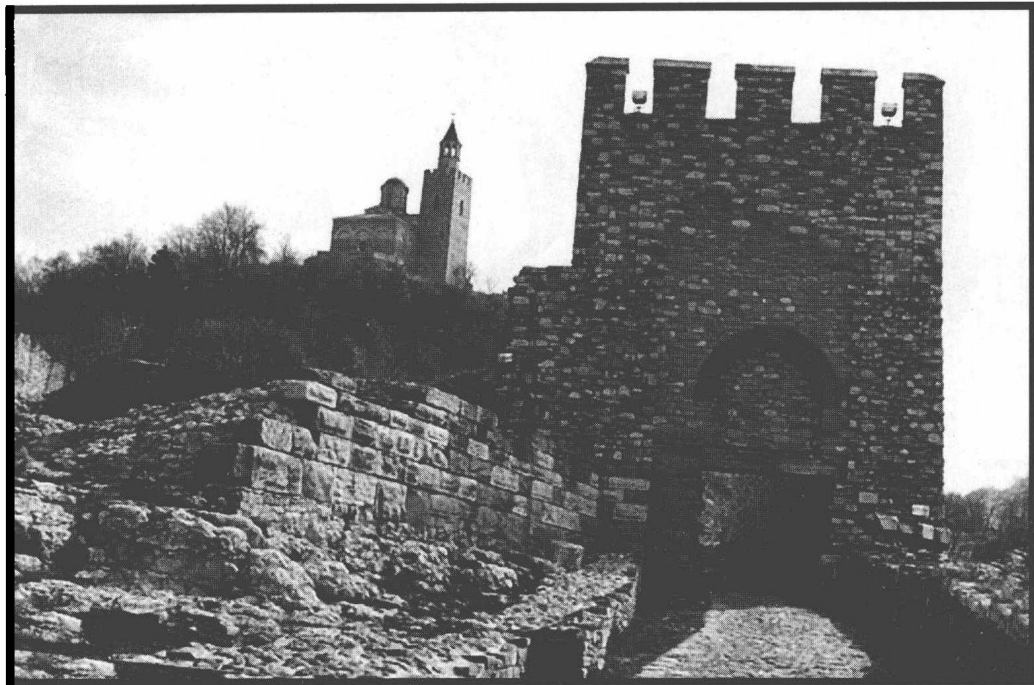
诞生。1204年十字军灭掉拜占廷后，保加利亚借机吞并色雷斯和马其顿，并在1230年灭掉了伊庇鲁斯专制国，其疆土延伸到三海（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滨，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

拜占廷复国之后，新兴的塞尔维亚帝国对巴尔干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保加利亚不得不与拜占廷结盟，抵挡塞尔维亚人的进攻。大约在14世纪中期，保加利亚已经丧失了马其顿和多布罗加，剩下的国土又被伊凡·亚历山大沙皇分为两个国家——特尔诺沃王国和维丁王国，国家实力大大削弱。当赫勒斯滂海峡的亚洲一侧出现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时，保加利亚再也无法抵挡新的进攻了。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引起了巴尔干各国的惊慌。1352年，他们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62年，穆拉德一世登基，土耳其人开始了征服巴尔干的大规模军事行动。1364年，保加利亚的旧扎果腊和普罗夫迪夫落入土军之手，1382年索菲亚沦陷。土耳其人接着准备着手攻打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和波斯尼亚国王特弗尔特科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联盟，特尔诺沃王国沙皇伊凡·希什曼也加入了这一同盟。1389年，土军在科索沃平原击败了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联军，塞尔维亚就此变为土耳其人的藩属。然而穆拉德一世也在这场战争中送了命，由其子巴耶扎德继位。这个新的土耳其苏丹立志要完成征服保加利亚的霸业。

几十年来，保加利亚人曾与土耳其人殊死奋战，此时又为保卫其京城大特尔诺沃而进行了最后一次顽强抵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墙击退了土耳其人的多次进攻，坚守城池达三个月之久。最后粮尽援绝，京城在1393年7月17日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伊凡·希什曼沙皇也被巴耶扎德下令杀害了。1396年夏天，当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兴师反抗土耳其人时，另一个保加利亚王国——维丁王国也揭竿而起，赶走了土耳其驻军（此前他们曾被迫臣服于苏丹，允许一小队土耳其卫戍部队进驻维丁城）。但西吉斯蒙德不久后在尼科堡被打得一败涂地，维丁王国也就此沦亡，全部保加利亚人陷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竟达五个世纪之久。

保加利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处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繁荣的城镇和乡村化为废墟，教堂被拆毁或改成清真寺，田园一片荒芜。所有被征服的土地都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地产，他将其分给帝国的各个集团。最大的一块土地，成为土耳其军队的采邑，其士兵按照军龄获得年限不等的土地收租权。这些土地都由基督教农奴耕种。还有一部分被征服的基督徒需要负担特殊义务，比如充当土耳其军队的后勤辅助部队，在牧场上看管苏



丹的马匹，为苏丹宫廷饲养猎鹰等等。

在被当做牲口奴役的黑暗岁月里，深受东正教及拜占廷文化影响的保加利亚人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远在北方的“第三罗马”会担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在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发展为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强国，并自命为“所有斯拉夫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征服后，许多教会人士和学者都跑到俄国避难。他们有的在俄国教会中担任要职（比如莫斯科大主教），从而同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流亡俄国的保加利亚僧侣时常回到被占领的祖国，向人民宣传“北方沙皇”的威力，从而使保加利亚老百姓对俄国将会来“解放”他们的信念进一步得到加强。保加利亚人的另一个反应是加强了“海杜克”（即“游击队”）传统。尽管海杜克缺乏强烈的民族感，但他们保持着反抗精神并引出许多激发民族解放精神的传奇故事。

“来自北方的解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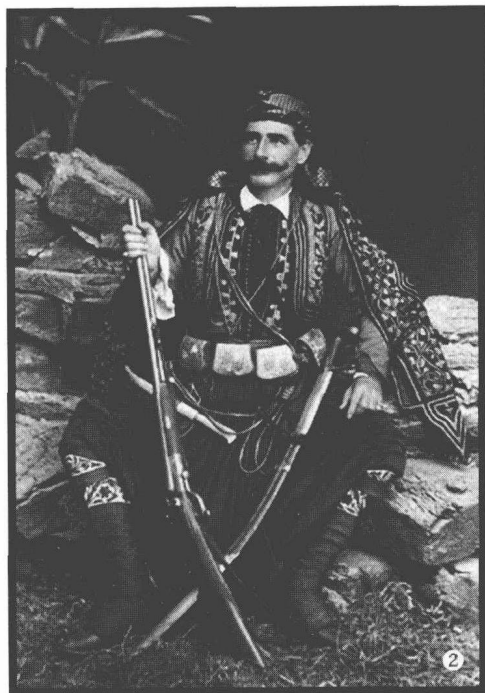
1768年，俄土爆发战争，俄军的一名保加利亚裔上校秘密潜入保加利亚北部，散发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宣言》，号召保加利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苏沃洛夫将军向



土耳其境内进军的途中，俄军得到了保加利亚游击队和居民的支持。1774年，俄土两国在保加利亚一个草原小村庄里签订了《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虽然没有改善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但是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俄国对土耳其境内的各基督教民族有“保护权”。这种措辞不够确切的让步令俄国喜不自胜，因为它使接连几代的沙皇有了借口，得以在尔后的八十年中不断干涉土耳其事务，并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806年，俄土再度开战，保加利亚人闻讯后欢欣雀跃，但是拿破仑的入侵迫使俄国结束了对土战争。1821年，希腊人民爆发起义，土耳其军队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暴行累累，沙皇尼古拉一世以此为由再次对土耳其宣战。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保加利亚人都曾起兵支援俄军，然而在战争结束后，又都被俄国丢给狂暴的土耳其人。

从19世纪初到保加利亚独立的这段时间里，逐渐老弱的奥斯曼帝国曾经多次致力于革新，但几乎都是一无所成。顽固、僵化而日益腐朽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几乎原封未动，继续成为进步和文明的巨大障碍，而土耳其也就因此而日益衰落下去。希腊、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拉维亚相继独立，使得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最富庶的几个行省，于是加紧了对剩下的欧洲领土的控制。不幸的是，保加利亚是狂热的土耳其移民最密集的地方，与帝国首都的距离也最近，因此受到的掠夺、剥削和监视也最严酷。直至19世纪30



1. 19世纪的保加利亚青年。

2. 土耳其“巴希-巴佐克”部队的士兵。

年代，在整个保加利亚没有一所正式的学校，只有很少（大约500名）保加利亚人有机会，在俄国“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去莫斯科读书。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保加利亚知识分子比留在国内的一般民众更早地看清了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暴君本质和压迫性质，波兰人在沙皇统治下的悲惨境遇使他们更加不信任泛斯拉夫主义那一套漂亮的言词。从19世纪60年

代开始，保加利亚爱国者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寻找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较少地依赖俄国的庇护。这些人想利用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来解放祖国，但是不想被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所利用。

尽管保加利亚民族领导人无意为沙皇火中取栗，但圣彼得堡却继续将金钱倾入巴尔干，因为土耳其的持续衰弱为俄国提供了插手干涉的机会。正如1853年尼古拉一世对英国大使谈起土耳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手头有一个病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坦白地告诉你，他一旦死去，特别是在一切必要的安排作好之前死去，那将是一桩绝大的不幸。”

1866年，柳贝恩·卡拉维洛夫和瓦西尔·列夫斯基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了秘密组织“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全国起义做准备。普法战争之后，俄国趁机宣布不再承认克里米亚战争后英法强加给俄国的黑海非军事化的义务，于是人们纷纷议论，“巴尔干积雪融化时，春季风波恐将再起”。

1875年7月，奥斯曼境内黑塞哥维那省的基督徒开始反叛。到8月，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起而反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子。总部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做好发动全面起义的准备，保加利亚诸省便在1875年9月16日发难了。由于准备不足，起义为时甚短便被扑灭。次年春天，从罗马尼亚渡河潜入的“保革委”特工又

在农民中煽动不满情绪，于是起义再度爆发。保加利亚农民攻占了乡下的土耳其衙门和派出所，城市居民则在教堂鸣钟作为城区起义的信号。土耳其人早已有戒备，调来了装备优良的“巴希—巴佐克”部队（非正规军），接着又调来了正规军，步、炮、骑兵俱全，经过六个星期的战斗，毫不费力地将其扑灭了。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以及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三万多名男女老幼被屠杀，许多村庄都变成了一片片大坟地。土耳其非正规军的胡作非为激起西方人的愤怒，从而改变了这场“东方危机”的性质。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英国《每日新闻》和美国《纽约时报》把土耳其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细节如实地告诉给读者。英国自由党领导人格莱斯顿批判保守党政策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在出版的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四万多份。雨果、加里波第、达尔文和王尔德等名人也为“捍卫保加利亚人民”向英法公众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土耳其的暴行在俄国掀起了更愤怒的风暴。俄国老百姓为受难的保加利亚人捐款，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门捷列夫等名人也表达了“随时准备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援助斯拉夫兄弟的迫切愿望”。由于俄国的坚持，欧洲列强成立了一个调查团，对土耳其暴行进行调查。

这场“东方危机”随着俄国和奥匈在1877年1月秘密达成的“布达佩斯协议”而恶化了。该协议保证奥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随意行事，奥匈则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友好的中立。两国彼此默认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但奥匈迫使俄国保证，打败土耳其后“绝不成立一个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巨大的实体国家”。随后，由于俄国的坚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列强会议，研究保护土耳其基督徒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列强建议土耳其，给予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权。但是，新即位的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拒绝了这个自治方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这个拒绝真是喜上眉梢，1877年4月12日，他向土耳其宣战。

这场战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主战场在保加利亚，在高加索也打过一仗。俄军在6月15日至27日渡过多瑙河，然后兵分三路作战：西路指向尼科堡，东路进攻鲁塞，南路则向大特尔诺沃和巴尔干山脉进军。俄军最初似乎一切顺利，到7月中旬他们就控制了巴尔干山脉，先头骑兵已经跨过地处要害的希普卡隘口，进入色雷斯大平原。但是，由奥斯曼帕夏指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固守普列文城，由苏莱曼帕夏指挥的另一支军队从亚德里安堡向巴尔干山脉进发，在旧扎果腊同俄军发生激战，在整个秋季和初冬击退了俄军的三次进攻。俄国迫于情势，便放下架子，同意卡尔大公指挥的一支三万人的罗马尼亚军队参战。